

●李超平

中国公共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

摘要 建国以后,中国图书馆职业从来没有缺少过核心价值观,但是那些核心价值观的确定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确立过程和图书馆职业对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过程。而始于2007年的中国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研究,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图书馆服务宣言》表述的不再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政治任务,而是我们职业整体的理想宣示,也是所有从业者在工作中共同努力的方向。作为承载中国图书馆人核心价值观的《宣言》的问世,恰逢最好的历史时期。参考文献18。

关键词 《图书馆服务宣言》 图书馆核心价值观 图书馆事业史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1949, Chinese library profession has always had its core values, but they were formed from the top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library professionals had to accept them passively. The studies of core Chinese library values since 2007 has its new independent features, and *Library Service Manifesto* formed on their basis is no longer a political task, but a manifestation of the ideal of the whole profession. The *Manifesto* carries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librarians in the best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profession. 18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ervice Manifesto*. Core values of library. Library history.

CLASS NUMBER G250

《图书馆服务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起草的背后,是一项持续的学术研究。这一研究的核心直指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观。根据肖珊、范并思的研究,国外公布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中,“服务”这一主题词的词频最高^[1],这很清楚地揭示出现代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观中“服务”的重要地位。在中国图书馆界决定以《宣言》的方式向世人宣示围绕服务形成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笔者对建国以来中国图书馆职业围绕“服务”而确立核心价值观的历程,作一次回眸式的打量,以历史的视角来梳理中国图书馆职业价值观的形成与演变,试图对刚刚问世的《宣言》给出一个相对完整而富于历史感的注释。

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较新的术语,意指图书馆界对于自己的责任或使命的一种系统的说明^[2]。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术语所表明语境,客观上是一直存在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有很多形态,包括潜在形态,如果以这种思路,在我们今天讨论图书馆核心价值观之前,即已存在某种形态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

本文从这种潜在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开始讨论,为简便,下文均称为核心价值观。

1 中国公共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次确立

1955年7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公

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使命进行了认定:“公共图书馆是以书刊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文化事业机构;是党和政府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的有力助手……。”^[3]这是对“公共图书馆是什么”的权威界定,这一界定明确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使命,这一使命又构成了决定职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价值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说,价值是客观的,价值观是主观的^[4]。那么,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就是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而围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内容对人民履行宣传教育的责任,是公共图书馆对自身使命判断的价值观。于是,职业任务的执行如果体现了“宣传工具”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完成了“收集、保藏并积极利用图书、杂志、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向广大人民宣传马列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人民获得各种文化、科学知识”的任务,就是正确的,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另外,按照李德顺先生的观点,“任何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它本身都有自己的核心”^[4],在构成中国公共图书馆职业的价值体系中,不可能找到比《指示》中对公共图书馆社会使命的规定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因为凡是违背这一价值观的任何职业行为都将不被允许,这一价值观无疑构成了公共图书馆职业面向服务的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所以,《指

示》中对公共图书馆社会使命的规定,事实上是建国以后首次由政府职能部门为公共图书馆职业团体确立的服务工作的核心价值观。以这一“使命”为前提,《指示》还规定了服务对象选择的价值观:一是“广大人民”,二是“党和政府机关、科学文教机关、团体”。后者被单独列出,表明其是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被强调的。至此,“区分服务”、“重点服务”的服务价值观也初步确立。

由政府职能部门——文化部来为公共图书馆确立职业核心价值观,这是由我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决定的。文化部作为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机构,在政事合一、管办合一执政理念的支配下,理所当然地认为有责任来规定公共图书馆社会职能和服务工作的价值取向。而公共图书馆职业团体在这样的体制下,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以行政指令所赋予的职业核心价值观。尽管对于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接受是被动的,但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直接管理方式使其在图书馆工作中的指导作用的实现并不困难。当年在浙江图书馆采编部任职的黄景行老人告诉笔者,相对于以前阵地式的工作方式,从那以后,图书馆开始走出大楼,把书刊直接送到工厂、农村、兵营等,并积极主动向工农兵群众推荐优秀书刊。可见在《指示》的指引下,地方图书馆立即调整了服务理念,并找到了实现这一核心价值观的方式。在以后几年里,各地图书馆纷纷以《图书馆工作条例》的方式表达了图书馆职业对上述核心价值观的接受,比如,湖北省图书馆1960年确定的图书馆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著作,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明确“政治是统帅,生产为中心”的服务观点^[5]。此外,在工作层面上还有许多为提升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服务质量的举措,比如各地图书馆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都有关于编制宣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参考资料索引和参考书目的内容,如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着手编制马恩列斯三大全集翻译参考书目^[6]。

2 中国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的再次确立

1956年7月5—13日,文化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向会议提出了《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的报告^[7]。这次会议和这份报告出台的背景,是1956年初那次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毛泽东“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的重

要内容之一是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包括生活待遇、工作条件等几个方面。而说到工作条件,文献保障的问题就必然被提及。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按照政府行政工作中上下级的指导关系,在国务院总理的报告之后,文化部必然作出具体的反应,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会上讨论的报告,基调是:“提供科学研究的图书资料,是我们文化部门和图书馆工作者一个艰巨而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们应该以极大的努力来担负起这一个任务。”在这一基调之下,报告确定了图书馆事业的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流通图书,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积极性;二是向科学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两者不可偏废。”

在保持原有核心价值观不变的情况下,新增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内容。表面上看,这只是增加了服务的对象和服务工作的任务,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去理解,那是没有真正理解这次会议和文化部报告的真正意图。从刘芳整理的随后各地为传达会议精神而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对当地图书馆工作的部署^[8],以及对黄景行老人访谈所获得的信息来看,如果只是工作内容的拓展不可能有那么大力度的思想动员和组织落实。以浙江图书馆为例,据黄景行老人当年的工作笔记记载,浙江图书馆专门召开会议传达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思想动员和工作部署。当年任浙江图书馆副馆长但实际主持工作的张英田先生根据文化部报告精神明确指出,为科学研究服务和为知识分子服务是省级公共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点。他还特意举例说明,浙江图书馆曾经发生过拒绝学生入馆的情形,工作人员的理由是,公共图书馆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学生是知识分子,图书馆从保障工农兵服务的立场出发,可以拒绝为知识分子服务。根据这个例子,张英田强调了必须转换对重点服务对象的认识,并且把这一认识提高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国家要在科技和经济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要有能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文献保障。”从这里我们发现,张英田的举例可谓用心良苦,其深意决不仅仅是新增一项任务所能涵盖的。此外,

为了顺利完成“为科学研究服务”这一新任务,浙江图书馆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予以保障:一是图书馆员要提高服务技能,制定个人红专规划;二是开辟科学阅览室,编制专题目录,提供科技文献查询服务;三是文献采购向科学技术类倾斜。当“向科学工作研究者们提供图书资料,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被提高到与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时,表明这已经涉及到增加图书馆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使其共同成为判断公共图书馆社会价值的标准,尽管这一新的价值观是以“政治任务”的方式传达的。

1956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的社论^[9]。社论论述了图书馆在向科学进军中的两项任务:“一项是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图书资料,也就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一项是通过书刊的借阅,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的后备力量。两者不可偏废。”在具体工作层面,社论甚至提出了几点措施,涉及馆藏清理、文献调配、编制目录和索引、改进借阅制度、修建新馆等。如果说文化部会议及其报告仅仅是向图书馆业界传达了国家意志,那么《人民日报》社论则是既向图书馆职业团体传达国家意志,又向全社会传达了国家意志下图书馆职业团体的另一项社会使命,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为科学研究服务”是一项整个图书馆职业的使命,并不仅仅限于公共图书馆。在当年不多的专业文章中,文献[10]论述了医学院图书馆在“向科学进军”中担负的重任,其专业的认知角度与《人民日报》社论的意图高度一致。

尽管这两份文稿的字面上都只是给定了“任务”,但从职能部门的动员令,到《人民日报》的兼有传达政策意图和舆论宣传双重作用的社论,以及职业层面的反应,让我们进一步相信这包含着远不止布置一两项任务那么简单的意义。

3 第三次确立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1956年第一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以后,以确立图书馆阶段性任务或使命为内容的全国性会议和文件没有出现。尽管期间有过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和重要文件出台,包括198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的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提交的《全国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以及1985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但都是针对当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现状提出的一些对策式的决议和工作

推进思路,没有针对图书馆职业的价值和价值观提出任何新的内容。直到1990年末,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公共图书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文化部图书馆司副司长鲍振西做了《明确方向,认清职责,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主旨报告,此外还提交讨论了文化部《关于加强公共图书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6]¹³⁶。

这次“经验交流会”召开的背景,盖因在198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从鲍振西副司长的主旨报告到文化部《意见》讨论稿的内容来看,这次会议再次向中国公共图书馆职业团体传达了新形势下的国家意志。在这一意志中,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观有了新的内容,即作为收集、存储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宣传文化教育阵地的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之所以认为《意见》是对核心价值观的增补,是基于一种逻辑关系的判断。就公共图书馆的价值而言,“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一早已确立的价值本身并没有改变,只是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有了新的拓展,即“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这一新增内容,是针对主观层面而言的,即是服从于《决议》精神的,而《决议》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则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在中国社会中建立某种核心价值观的手段,公共图书馆因此而增加的“为精神文明建设而发挥宣传教育”的使命,毫无疑问仍然处于职业价值观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早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延展到个人理想、品德、行为规范等“精神文明”范畴,比起“工具”说,这一次对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补充,使我国公共图书馆向着现代图书馆的价值取向有了一次靠近,因为在这一新的职业价值观下,直接受益方不是“党和政府”,而是民众自身。

4 自主选择:基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4.1 行政主导方式的失败

按照前文的梳理和分析,建国以后,中国图书馆职业从来没有缺少过核心价值观,尽管在当时那也并

不是这个职业核心价值观的全部。除去“文革”时期,那些核心价值观的确也在相应的历史时期决定着图书馆职业的行动方向和价值评价。但那样的确立方式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是值得分析和反思的。

如果说一个职业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该职业的从业者共同持有的职业信念和价值体系,那么,该职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离不开人们长期的实践活动和共同认识,正如美国图书馆界始于1996年的对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那其实是从学术上对长期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事实上的共同认识进行发现和书写。几十年里中国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缺少一个共同认识的过程,在自上而下的“确立”中,图书馆职业别无选择,使命、责任、行动方向、职业伦理,一切都被规定了,在接受一次规定之后,开始等待下一次规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心理依赖,即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行动,职业行为符合了“规定”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完成了上面布置的任务就是成功,反之就是失败。在这种机制下,职业本该自主形成的专业性思考被完全取代,最终导致专业自主意识的丧失。几十年里,这个职业的社会评价并不高(即使按照过去的政治化标准来衡量)的事实让我们确信,尽管这个职业一直在“接受”着并行动着,但并没有将那些自上而下确立的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一种自觉意识。不是每一次“确立”都有思想动员吗?是的,那些思想动员甚至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思想动员的内容大都是在传达政府意志以后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甚至不允许不解和怀疑,到了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的方式,因为缺乏一个内化认同的机制,从而造成表面上并不是没有决定职业价值取向的规定,实际上从业者普遍缺失职业信念的现状。

这也许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教训,即一个职业的从业者,其职业信念的树立,必须要经由专业语境的培养。那种通过行政主导而确立职业核心价值观的方式,由于其发布方式是行政文件,而行政文件有其相应的话语规范,比如把“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这样关乎职业使命的命题表述成“政治任务”,这符合行政意图的传达规范,但在行政指令与职业的专业话语之间,还缺乏一个翻译,使得从业者明明接受了一种核心价值观,却没有产生相应的认识,忽略了其作为核心价值观的真实意义,以至于我们一直误以

为这个职业没有核心价值观。

以行政指令方式确立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除了不能真正地让这种价值观转化为从业者的职业信念以外,它的另一致命之处是不能完整而准确地概括这个职业的价值体系。所以当社会公众在社会大环境发生改变以后,用一种更接近本质的眼光来看待或要求这个在身边存续了数十年的机构时,因对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方式和质量的不满而形成的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在世界范围内,以图书馆职业的普世价值为参照,我们不难判断这些矛盾与冲突产生的根源,即是因为先前那些业已确立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建立在专业性思维之上的,它们并不真正符合社会发展对这个职业的要求。所以,在社会不可避免地对这个职业的期望值不断升高时,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的许多从业者,其实从心底里缺乏对职业的认同感、行动的方向感,以及好与坏、对与错的判断尺度。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除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和管理体制下无法跨越的局限,也与职业的成熟度较低有关。现代图书馆职业在中国兴起的历史还不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动荡和战争,也没有为图书馆创造一个稳定、持续的职业发展环境,这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重新建立的图书馆事业体系既缺乏相应的实践积累也缺乏研究力量,职业团体本身不足以完成对核心价值观的完整发现与归纳,即使有个别学者在研究论著中涉及相关内容,但无法达到从职业团体的角度来形成认识与表述的状态。在专业话语缺位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势介入就在所难免。由于政府职能部门本身并不具备研究、发现、系统表述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的能力,只能与国家的主流价值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以往中国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观的不完整和不科学是由它的产生机制决定的。

4.2 从迎合到突破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根据国家意志的需要所完成的对包括图书馆服务对象、社会使命、服务方式等在内的核心价值观的确定过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确立过程和图书馆职业对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过程。久而久之,图书馆职业也形成了一种迎合主流意志的惯性,以至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政府没有根据社会转型的需要及时对图书馆职业的核心价值给出调整或补充指令的情况下,图书馆职业试图寻求能够迎合在社会转型中政府意志的方式,以文养文无疑是“迎合”的结果。今天

谴责当时图书馆职业的选择是对职业信念的放弃并不公允,因为一直以来的职业信念就是对政府意志的迎合。

21 世纪的到来使我们有了百年回眸的时机,这种回眸必定要寻找某些参照系。这些参照系包括一百年前先贤们的图书馆理想和现今世界图书馆职业的普世价值。通过比较而产生对职业普世价值的认识过程并不复杂,好与坏、对与错、先进与落后,一切都逐渐清晰起来。于是,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和研究者,开始从专业认识上慢慢突破行政指令的限制,并由此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导致今天《宣言》问世的前期理论研究——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启动的,是先前一系列关于公众利用图书馆权利的研究、公共图书馆基础体制的研究、图书馆人文精神的研究,等等。在实践方面,从图书馆把借阅服务送到监狱里去和取消读者身份限制开始,就开启了一个按照图书馆职业社会使命的普世价值来主动选择服务对象的时代,不以身份来选择、区分和限制读者,保障公众的阅读权利逐渐获得普遍认同。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图书馆学教育的迅速发展,研究力量也在壮大,使图书馆职业在职业核心价值研究与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意识和话语能力,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新世纪以来一批学者如李国新、范并思、程焕文、于良芝等在不同研究领域的集中发力,关于图书馆自由的研究^[11-12]、关于公共图书馆基础体制的研究^[13-14]、关于图书馆精神的研究^[15]、关于图书馆存在理由的研究等^[16],如果没有这样一批研究成果,很难想像会有今天的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和《宣言》的问世。

4.3 自主研究与自主选择

始于 2007 年的中国图书馆核心价值研究,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表现在:

第一,自主研究。研究活动的启动是职业的自主选择,一种来自学人强烈的研究愿望获得了行业组织的鼓励与支持。研究愿望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如前文所述,是近几年来实践的发展和学术上前期研究相互关照的结果。在事业发展环境逐步向好的同时,学术界也以从未有过的关注介入事业发展中的许多层面,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呈现了一种表面冲突实则和谐的景象,面对一些看似超前的观念,实践界和学术界彼此都以一种在意、自我修正和客观务实

的姿态面对分歧。许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甚至因观念差异导致的行为冲突,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需要用一种方式来对这个职业的责任或使命加以系统的说明,并以此表明图书馆人的基本职业信念,这是该项研究产生的思想背景。还有一个大社会背景值得一提,即 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此举无疑成为中国图书馆界启动核心价值研究的直接推动力^[17]。最终对核心价值研究的启动,两位课题负责人——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公共图书馆馆长的组合方式,使这一研究具备了保证其先进性和现实性的先在条件。此项研究正式启动以后,在是否需要发现和归纳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问题上,迄今没有发现公开的置疑,相反,却迅速在学术刊物上成为选题热点,这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接纳和认同。而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们也系统阐述了中国图书馆职业核心价值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二,自主选择。图书馆核心价值不是我们去研究它才存在,黄宗忠先生认为,“图书馆核心价值自图书馆诞生之日起就存在,只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图书馆核心价值一直处于隐蔽、潜在、无人问津的状态”^[18]。图书馆核心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学术研究的作用就是对它进行发现、评价和表述。发现和评价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关联性,共同完成着对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确认。其中,发现的过程就是对图书馆职业业已形成的、并得到普遍认同的职业理念进行梳理和提炼的过程,评价就是看其是否能体现这个职业的最大社会价值、能否引领职业更正确和更具效率地实现职业责任或使命,符合这样的标准就确立为核心价值。这一次对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专题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宣言》,就是一次完全由行业自主的发现、选择和确立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其依据来自于《公共图书馆宣言》、国际上通行的职业理念、近几年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相关成果以及近几年来国内图书馆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第三,专业话语。《宣言》是对与服务有关的图书馆核心价值观的表达,它不仅是职业团体内部对相关核心价值进行确认的文本,更是职业团体向社会宣示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宣言》文本以公众能够接受的文字表述了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责任和服务,同时这一表述也是符合专业话语规范的。

已有的研究表明了向社会声明核心价值观的必

要性^[2],但在实际操作上,却是对这个职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勇气的考验。因为从逻辑关系上说,在声明了图书馆的社会使命以后,就应该表达为完成这些使命的作为。它必定是一种承诺,表达和不表达这一承诺,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重要的,尤其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面临新兴信息服务业的强烈冲击的时候,这种表达有助于让社会对行业存在的价值进行重新确认,也有助于社会树立起对这个行业的信任。另一方面,由表述而导致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因为“承诺”不完全是从现实的职业行为中提炼出来的,它可能基于一种对职业普世价值的认同,即是由职业使命和责任的一种逻辑派生,所以,从整体上,职业面临“能否做得到”的心理考验;从个体上,在职业整体的承诺之下个体图书馆客观上可能不具备兑现承诺的能力。某些暂时不能超越的局限造成了某些遗憾,表现为行业的信心和自律意识还不能完全到位,比如要不要向社会作出“图书馆对全社会开放和平等服务”的承诺?尽管这在我国公共图书馆实践中已经呈现普遍接受的势态,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这涉及到实现机制和难易程度的差异,其接纳的底气和勇气是不一样的。最后,《宣言》文本未能出现“承诺”二字,而代之以“我们的目标是”这样模糊了现实与未来关系的表述语句,就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宣言》是一次以专业表述来表达图书馆职业的社会使命、道德信仰、服务理念的机会,其对于图书馆人的重要性在于:由专业话语更容易产生职业的认同感,它不再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政治任务,而只要求从业者在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中去感悟和实现,它既是职业整体的理想宣示,也是所有从业者在工作中共同努力的方向。诚然,《宣言》能否恰当地表述职业核心价值观,这对表述者构成了一次极大的挑战,在一些观念和现实的局限之下,不可避免会导致表述得不尽如人意。但对于一次起步,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地用赞许的姿态去面对它,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改变中国图书馆事业进程的里程碑。

《宣言》是中国服务性行业的第一个行业性宣言,它表明中国图书馆职业的理想主义回归,尽管这一回归还不那么彻底。在我们等待《宣言》问世的时候,分歧并没有消解,即使在《宣言》问世以后,意见表达还将继续,《宣言》还会被继续修正,直到它能真正表达这个职业的自信和勇气。

5 图书馆核心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趋同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方面的方针政策,如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发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这一系列政策中所倡导的普遍均等原则,其中蕴含的公平与平等的和谐社会理念,与近十年来中国图书馆界的学术追求是一致的。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在这里论证这种一致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仅从现象看,从时间上早于国家政策的学术研究的轨迹来看,这种一致性不再是职业/专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尤其是文化行政部门逐渐实行的管办分开的执政策略)使学术研究和新的服务理念的形成有了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的事实,正是这一自由空间,要求图书馆职业具有利用公共财政独立实施公共服务的能力,而这种服务能力又依赖于职业的价值判断能力和自律能力。这一次对职业核心价值的研究以及《宣言》的发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国图书馆职业作为一个专业化职业正在走向成熟。一个成熟的专业化职业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自主性,而独立自主的价值体系是职业自主性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为前期图书馆界对现代图书馆理念和核心价值的研究与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在历史长河中的合流而庆幸,因为这种“合流”,使图书馆核心价值在“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文化方针中有了最好的落点。所以,作为承载中国图书馆人核心价值观的《宣言》的问世,恰逢最好的历史时期。

参考文献:

- [1] 肖珊,范并思. “图书馆核心价值”调查与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07(3): 15-21. (下转第89页)

- 01-08]. <http://www.natlib.govt.nz/files/EconomicValuationReport.pdf>.
- [14] Message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Glenda E. Hood [R/OL]. [2008-01-08]. http://dlis.dos.state.fl.us/bld/roi/pdfs/2005_SLAF_ROI_report.pdf.
- [15] Mitchell, R. & Carson, R.. Using Surveys to Value Public Goods: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M].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989:2-13.
- [16] Survey of public library users in florida [R/OL]. [2007-12-01]. <http://dlis.dos.state.fl.us/bld/roi/surveys.cfm>.
- [17] Cummings, R. G. et al. Valuing Environmental Goods: An Assessment of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M], Totowa, NJ: Rowman and Allanheld, 1986:3.
- [18] [2007-12-01]. <http://economist.icxo.com/htmlnews/2007/03/02/1009245.htm>.
- [19] Public Library Benefits Valuation Study Methodology [OL]. [2008-04-08]. <http://www.slpl.lib.mo.us/using/valuationc.htm>.
- [20] British library. Measuring our value [OL]. [2008-04-08]. <http://www.bl.uk/aboutus/stratpolprog/increasingvalue/measuring.pdf>.
- [21] Barron, D. D. et al. The Economic Impact of Public Libraries on South Carolina [OL]. [2008-04-10]. <http://www.libsci.sc.edu/SCEIS/final%20report%202026%20january.pdf>.
- [22] Griffiths, J. M. Taxpayer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Florida Public Libraries [OL]. [2008-04-12]. <http://dlis.dos.state.fl.us/bld/roi/workshop.cfm>.
- [23] Arrow, K. J., Solow R., Leamer E., Portney P., Radner R., H. Schuman. Report of the NOAA Panel on Contingent Valuation [J]. Fed. Regist. 1993, (58): 4601-4614.
- [24] Public Library Benefits Valuation Study Key Findings [R/OL]. [2007-12-02]. <http://www.slpl.lib.mo.us/using/valuationg.htm>.

钱佳平 浙江大学图书馆期刊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 浙江杭州。邮编 310027。

刘兹恒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通讯地址: 北京。邮编 100871。

(收稿日期: 2008-08-01)

(上接第 24 页)

- [2] 范并思. 核心价值: 图书馆学的挑战 [J]. 图书与情报, 2007(3): 2-5.
- [3] 文化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 文陈社图字第 52 号, 1955.
- [4] 李德顺. 关于价值与核心价值 [J]. 学术研究, 2007(12): 13-16.
- [5] 湖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八十年 [J]. 图书情报知识, 1984(3): 1-7, 36.
- [6] 陈源蒸等. 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138-139.
- [7] 文化部. 明确图书馆的方针和任务为大力配合向科学进军而奋斗 [J]. 图书馆工作, 1956(4): 1-5.
- [8] 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大势, 历久弥新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44-45.
- [9] 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 [N]. 人民日报, 1956-08-28(1).
- [10] 顾崇书. 向科学进军中的图书馆工作 [J]. 新北医, 1956(49): 35.
- [11] 李国新. 日本的“图书馆自由”述论 [J]. 图书馆, 2000(4): 12-16.
- [12] 李国新. 对“图书馆自由”的理论思考 [J]. 图书馆, 2002(1): 16-21.
- [13] 范并思. 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 [J]. 图书馆杂志, 2002(11): 3-8.
- [14] 范并思. 加强公共图书馆研究 [J]. 图书馆, 2000(6): 1-4.
- [15]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 [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5): 61-65.
- [16] 于良芝.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 来自图书馆目的的注解 [J]. 图书与情报, 2007(1): 7-15.
- [17] 范并思. 图书馆核心价值: 理念、历史、现状和愿景 [J]. 图书与情报, 2007(3): 1.
- [18] 黄宗忠. 论图书馆核心价值(上) [J]. 图书馆论坛, 2007(12): 3-8.

李超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副教授。通讯地址: 杭州。邮编 310012。

(收稿日期: 2008-08-29)